

從福利國家到基進民主

—談兒童福利的新思考—

(Radical Democracy)

張盈堃

一、前言

兒童福利 (child welfare) 為社會福利的主要領域之一，其定義非常廣泛，並無一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但就狹義的面向來說，兒童福利是以問題取向 (problem orientation) 為主，針對特殊福利需求的兒童給予福利服務措施；就廣義的面向來說，兒童福利是以發展取向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為主，所關懷的對象擴及至一般兒童的福利需求 (周震歐，一九九五；馮燕，一九九五；彭淑華，一九九八)。

在西元一九五九年聯合國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 of the child) 中指出：「凡是以促進兒童身心健康發展

與正常生活為目的的各種努力、事業以及制度等均稱之為兒童福利。」，有鑑於此，世界上各國均先後制定兒童福利政策，頒佈兒童福利法規，具體明文規定政府社會應共同為支持強化家庭功能負起責任，以利兒童能在不匱乏、無恐懼的親生家庭中，安全而有尊嚴的健康成長，台灣當然也不例外。不過多數的研究在思考兒童福利議題時，多以國家的鉅視層面著手，因此探討各項兒童福利需求與措施、制度，但是一連串福利國家危機之後，到底兒童福利新局面又該如何定位？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社會學大師 Habermas (1975) 在「合法性的危機」(legitimization crisis) 一書中，探討了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出現新社會運動的結構性因素。Habermas 借用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架構，將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系統」、「政治行政系統」與「社會文化系統」的互動關係扣連起來，重新詮釋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所面對的重要問題：一個多元決定 (over-determine) 的合法性危機。

而我們可以根據危機傾向的類型來區分每一種的系統，比如說在經濟系統裡面，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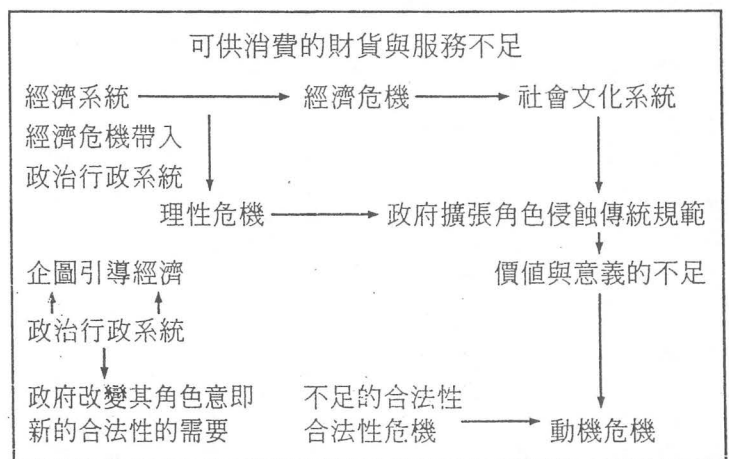
沒有足夠有效的價值物產出時，會出現所謂

一、福利國家危機

的經濟危機 (economic crisis)：在政治行政系統裡，如果缺乏合理可信的決策，會出現理性危機 (rationality crisis)，如果還是繼續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而喪失人民的支持時，就有可能會形成合法性的危機 (legitimization crisis)。Habermas 延續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週期性危機的分析，認為在一般的利率下降與產業後備軍的擴張下，凱因斯主義國家干預成爲消解經濟系統危機的必要手段。國家爲了維持利潤，必須從事社會投資，爲了消解階級間的衝突、維持充分的就業，並延續統治的合法性，國家必須負擔社會消費，因此也就是推行了福利國家，但是在增稅以維持合法性與刺激資本累積的兩難下，將也會引發國家行政系統中「國家財政危機」(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O'Connor, 1973)。在社會文化

帶來最大的傷害，因爲在沒有真正合理的溝通倫理下，就不可能引發公民參與的動機，以致形成動機危機 (motivation crisis)。綜合上述所言，當某一個系統的需求 (demand) 超過其所能提供的範圍時 (inherent resource)，就會形成危機，其結果不是導致該系統的崩潰瓦解，不然就是將危機轉移到其他的系統中。(龐建國、劉錦常，一九九〇；王順民，一九九三；林萬億，一九九四)(如圖一)

在 Habermas 的論述中，他認爲「經濟危機」成爲一種客觀的事實時，勢必要將其轉換至其它的系統中，以保持經濟系統得以繼續地運作。換句話說，此時政治行政系統就必須接下這項燙手的難題，在資本家的利潤與一般人民的利益之間做理性的選擇，而 O'Connor (1973) 與 Gough (1979) 認爲資本主義體制下福利國家的功能即是累積與合法性。Habermas 引用的 O'Connor 的概念，認爲這個時候國家機器慣常採用的策略爲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社會費用 (



圖一 Taylor, Gooby Peter and Jennifer Dale(1981)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welfare. p243.

social expenses) 以及取代若干以市場機能爲主的商品供給。以福利國家中的例子來說，當各種社會化制度或是措施（如競選時的兒童福利政見）不斷提出後而導致成本持續上漲時，福利國家又必須提供那麼多的福利供給以實現保障與維護社會正義的承諾時，

其結果勢必為政治行政系統帶來更多的危機。

當然在最後階段，勢必又會轉至動機危機上面，也就是個人與社會的認同問題（individual's person's and social identity），放在兒童福利的脈絡中就是國家機器所制定的福利措施與民間的福利需求無法配合。

對於Habermas合法性危機的批評，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二點。其一為許多學者指責這項論述含有結構馬克思主義的遺毒，或者可說是「派森斯偏誤」（Parsonian bias），因此成為去歷史脈絡的、目的論的系統、結構分析，關於這一項的批評，Habermas的學生Offe在「福利國家的矛盾」（Contradic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中也「認罪」了（Offe, 1984）。其二為也有學者指責Habermas的研究未落實於經驗的層次，同時也沒有辦法做為實踐的指導（鄒川雄，一九九四；林宗弘，一九九七）。對於第二項的評論，Habermas在後來的著作「交往行動理論」已經有部分的回應，儘管仍處於理論的層次上面，但這亦是本文嘗試以基

進民主的觀點來談兒童福利可能性的契機。

如果套用馬克思的話，對於從福利國家角度來看待兒童福利的政策、制度與措施，可以說是「用頭在走路」，但是若要避免所謂福利國家危機的威脅，在各種福利國家轉型的討論中，本文嘗試以由下而上的觀點來看待兒童福利的論述，因此相對於福利多元

主義（Welfare Pluralism, Johnson, 1987）、福利的政治經濟或是混合經濟（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 or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 Wistow等, 1994）、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福利充權（welfare empowerment）、福利組合（welfare mix：鄭讚源，一九九七）、經濟全球化觀點（陳小紅，一九九七）……等福利國家轉型的說法中，我認為為基進民主的概念也可以用來重新詮釋兒童福利的可能性。我認為最理想的方式應該是透過Burawoy（1993）所提倡的「擴展個案方法」（extended case method）參與式觀察，以了解底層對於兒童福利的需求，進而才能形塑兒童福利

論述之公共領域的可能性，但是本文只停留在論述的層次上，並沒有真正的進行田野工作（field work）。

三、福利需求的偏差

在Habermas對福利國家危機的論述中，動機危機的產生就是來自於個人及社會的認同問題，若是放在兒童福利制度、政策、措施的脈絡中，也就是民間底層的福利需求與國家機器之間有嚴重的落差。兒童福利的需求是一種民意概念，現在民意概念的一般普遍意涵為：「社會上大多數人針對某一議題的共同意見。」（賴世培等，一九九六；蘇衡，一九八六；彭芸，一九八六），但是在當今許多兒童福利的研究中多以實證分析的問卷調查方式來探求兒童福利的需求，只有少數以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等質性研究觀點著手，因此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受訪者只是在有限選擇的問卷下表達其福利需求，這是否為民間底層真正的聲音，還是個未知數。

以Habermas的觀點來說，真正的福利需

求是經過公共討論中理性反省過程後的產物，原則上傾向一般利益與共識，這樣的需求乃是從理想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中產生的集體福利需求。Habermas 特別以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等自由主義憲政國家的社會藍圖（如圖二）為例，說明在此種的社會中，以資產階級公眾為主體的政治與文字公共領域成立，成為中介於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客觀中立機構；相對於這樣的論述，Habermas 以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的社會福利國家時期，各種新式科技的發展對於社會結構帶來的扭曲，此一時期的社會結構轉型如圖二，使得古典自由主義時期人與人之間因互動、溝通所達成的公共性，轉型成為被操控性的組織原則，真實的理性需求在這種扭曲的公共領域下不再得以呈現，所謂的「福利需求」成為部分團體操控形成的非公共性意見。

如果將圖二與圖三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做對比，我們可知在社會福利國家時期的整體社會結構中，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區隔分明相互對峙的現象已被打破，在這個時期中，商品的交換結構從原先的自由市場競爭朝向以寡占大廠商為主的壟斷市場結構，原先自由競爭的勞動市場則具有強大調節議價能力的工會成立介入，而政黨與國會等主要公共領域也放棄過去啟蒙大眾的政治討論，政黨轉變成為大眾政黨，往往以政治行銷的手法來影響操控大眾，以求得選舉勝利或是提昇其政治聲望。原先形塑資產階級公共性重要場域的報業或是俱樂部等文字公共領域，則從著重公共辯論與評論的新聞論壇，轉變成為追逐商業或是政治利益的大眾媒體，受到商業與政治因素為主的影響與操控，同時在以往熱中於討論文藝中自我經驗的沙龍或是俱樂部活動，現在則傾向迴避談論明確的意見，而一度作為經濟、文化、政治生活中心的城鎮，則變成消費性格濃厚的都市。此外，過去有助於資產階級個人主體性培養的家庭功能也發生了轉變，愈來愈多的家庭功能被其它社會機構所取代，家庭愈來愈朝向為商品消費共同體（community of consumption）的擬似私人性（pseudo private）

的方向發展，Habermas 使用「家庭的再封建化」的概念來指稱此一變遷。在當今各種福利制度的的施行下，使得國家的功能日益介入經濟與文化的私人領域中，是符合真正的福利需求還是個未知數，但是在此情形下，一方面形成技術官僚專斷決策的模式，積極調節資本累積的問題，就另一方面，以往著重於公共性展現的公眾討論也轉化成為對於領袖人物魅力的崇拜，如同於「再封建化」的說法。（Habermas, 1962；陳川正，一九九二；林文凱，一九九七）。相對於 Habermas 的論述，Baudrillard 的理論則著重於「再現」（representation）系統的歷史觀點分析，他企圖從再現秩序的歷史變遷描繪出西方社會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操作邏輯轉變的系譜關係，根據此一變遷的圖像他分析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世界變動中的社會邏輯，藉以批判各種現代性分析概念（如生產、勞動、需求……）的不適切性，認為應該以後現代性概念（如消費、符號、誘惑……）取而代之，

Baudrillard從這些概念認為在戰後高度商品化的消費社會裡，各種高科技呈現擬像的媒體（如大量的民意調查），已經營造出新

私人領域 (Private sphere)	公共權威領域 (Sphere of public authority)	
市民社會（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域）	政治公共領域（政黨、國會） 文字公共領域（俱樂部、報業）	國家（警察的區域）
家庭內部的空間（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城鎮（文化產品的市場）	宮廷（貴族社會）

圖二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藍圖 (Habermas, 1962: 30)

私人領域	公共領域	公共權威
商品交換：寡佔大公司 社會勞動：工會 家庭：擬似消費的大眾	政黨、國會：操縱公共性 報業：大眾消費服務； 俱樂部：遊樂社交 歡呼式的民主 城鎮（文化產品的市場）	國家：官僚技術 資本累積

圖三 福利國家的公共領域（陳川正，一九九二：四七；林文凱，一九九七：五）

型態的社會文化面向，所呈現的大量擬像與其所欲再現、指涉的現實逐漸模糊化，過去現在性時期所宣稱的民意、福利需求或是真無關的擬仿秩序。

實的公共領域已經變得與公共集體意識無關的擬仿空間，所遵循的是與真實的福利需求無關的擬仿秩序。

在「符號交換與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的著作中，Baudrillard初次提出擬像概念的歷史觀點分析，就是系統性的重新分析再現的概念，即符號與真實之間的歷史關係，試圖說明真實（福利需求）如何透過符號（數據、圖表、文字）被再現出來？而這之間的關連性又是什麼？是真實在駕馭符號（即真正的福利需求可以被呈現）？還是符號統攝著真實被再現出來的可能性（即福利需求無法藉由數據、圖表或是文字真正地展現出來）？根據Baudrillard的說法為：

「擬像有二個秩序，自從文藝復興時代以來，就與價值規律成功的變化，相對應著。
——仿造 (counterfeit) 是自文藝復興以來至工業革命這段古典時期的主導架構。
——生產 (production) 是工業時期的主導架構。」

——擬仿 (simulation) 是現在符碼掌握階段的主導架構。

第一個秩序的擬像所依照的價值是自然規律的運作；第二個秩序的擬像所依照的價值是市場的邏輯來運作；第三個秩序的擬像所依照的價值是結構性的規律來運作。」(Baudrillard, 1993: 50)

Baudrillard根據其擬像的理論，大膽提出「社會性終結」的說法，放在社會福利的脈絡中，正是社會福利學者的「福利需求」概念提出徹底而基進的質問：「在社會福利中，預設了福利需求的社會性，好像是顯白自明的，只要著手進行量化的調查與統計分析，然而其實卻不是那麼一回事。」，根據相同的邏輯，Baudrillard也提及歷史、主體性與其它現代概念的終結。他分析邏輯的出發點乃是來自於其擬像秩序，在擬像的第三個秩序時期，大量的民意調查機構製造了數據、圖表……等符碼，以多重化的擬像福利需求呈現，在後現代的社會中，人類根本就是生活於擬像的生活世界中，由於擬像

與真實的福利需求間產生內爆 (Implosion) 現象，使得無法區別於真實與擬像之間，這同時也引導出他所謂的社會性內爆或是終結的說法，因為在擬像的社會中，當代社會時期是處於一個獨立自主的孤立個體，不再是經由外在的媒介網絡 (如 Habermas 所謂的公共領域) 取得一種外在性的客觀連結，相反地，人類個體之間的福利需求與調查機構媒介形成一種新的內在性關係，大眾之間福利需求的真實連結空間與調查機構媒介的虛幻擬像空間相互滲透，無法加以區分與切割。(Baudrillard, 1983, 1985)。

依據此種內爆的論點，Baudrillard批判現代性邏輯下民意操作者的現代民意概念，用他的概念來看待福利需求調查，福利需求調查 (即擬仿機器的運轉) 被投射為數據、圖表……等福利需求報告 (即再現) 時，因為受訪者的需求已經被斷裂化、符碼化，以至於統計機器的運轉，而在重組的過程中福利需求的主體性已經消失在數據的迷思中，這個虛擬的福利需求調查體制以及調查機構

是一個虛擬的公共領域，是一個比現實更現實的過度現實，它們卻成爲社會政治運作 (如政策的規化與制定) 的現實依據 (Baudrillard, 1985: 579-583)。準此，Baudrillard批判呈現民意 (福利需求調查) 運作的場域中所預設的理性與主體性的虛幻面，認爲福利需求擬像呈現正是遮掩了真正福利需求的不存在。換句話說，在以量化調查機構所建構的福利需求擬像空間中，福利需求調查所展現的不再是其所宣稱的「福利需求」的本身，而只不過是一些代表需求選項的符碼之自我指涉罷了。朱元鴻 (一九九六，引自林文凱，一九九七) 詮釋

Baudrillard的論述時認爲：「如果社會性是具有歷史性的意涵，那麼就有許多的可能性，它可能愈來愈成長壯大，可能愈來愈老朽，可能即將消逝，也可能已經死了，而只有社會學仍然供奉著，唸唸有詞地爲它的長生不老作證。」，同樣地放在社會福利的思潮中，或許民間底層的福利需求與福利需求調查所呈現的內涵已經有所落差與轉變，然

而在一般的福利需求調查專家眼中仍然被供奉著，爲其不在場做見證吧！

從Habermas與Baudrillard的觀點可知，如果只是停留在以量化分析的福利需求調查，因而以此來制定相關的兒童福利措施、政策，並不能真正反應民間的需求。雖然在許多的研究中已經以質性研究的觀點來探討兒童福利的需求，而且在需求的面向上也區分爲規範性的需求、比較性的需求、感覺性的需求與表達性的需求，但是仍以停留在菁英論述的層面上，民間的聲音仍然是在被動的狀態（註一）。此外，長久以來台灣兒童福利的觀點受到歐美各國的影響（註二），在福利需求調查項目上面更是明顯，以後殖民（post-colonialism）論述的觀點看待這種情形，是否歐美的兒童福利制度可以完全當成可攻錯的他山之石呢？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的固有社會結構因素反而被擠到邊陲的位置，而兒童福利政策在去脈絡化下，只不過是符應歐美中心主義的觀點（Hutcheon, 1988），在後殖民的論述中認爲後殖民的社會裡，是

採取去中心（de-centering）的觀點出發，是從文化上對立轉變成爲以平等地位對待並接受彼此文化差異的世界（Ashcroft, 1989），因此台灣的兒童福利需求與歐美的應該有所不同，故要掌握的應該是以台灣爲中心的兒童福利需求，如此才能在二者之間真正符合，爲了遵循此脈絡化的原則，必須從行動者、需求者的角度主動出發，這正是基進民主由下而上進行兒童福利論述的概念。

四、基進民主與兒童福利

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這個概念在Trend（1996）所編的radical democracy一書中提出來，Habermas認爲基進民主是社會主義體制消失後，左派唯一的出路，而我個人也嘗試把它看成擺脫傳統以福利國家角度的另類思考。正如同Burghardt & Fabricant（1987：455-456）在radical social work一文中所說的：「當今的基進社會工作者不在於反對特定的實質訓練與工作性技術的運用，而在於批判這些訓練所產生而加諸於專業關係上的變數。」，基進民

主的觀點也不是反對兒童福利的政策與措施，反而以由下而上公共論述的方式，來形塑台灣底層爲中心的福利論述。關於基進（註三）的概念，很容易被理解成爲改革、革命（Pritchard & Taylor, 1978）、或是政治行動（Halamos, 1978）、或是行動的實踐上（Gill, 1990），而基進民主正是強調民間底層的公共論述與實踐。

在傳統的兒童福利需求調查中，在量化的問卷下，民間底層真正的需求往往是被忽略的，這樣所研究出來的兒童福利措施與制度，通常只能算是單向性的宣達，而不算是真正雙向互動性的溝通（dialogic interaction）（林萬億，一九九二），這與基進民主中強調公共論述是很不一樣的，就交往行動理論來說，如果只是單向性的宣稱，而沒有進行理性的反覆性辯論（discursive argument），如此所制定出來的福利措施，套用Habermas的話，只不過是利用福利措施與福利制度等體制媒介，對兒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the colonisation of the

Life world)罷了。根據Taylor (1992: 20 5-209) 的看法，真正的公共論述預設著公共領域的存在，而所謂的公共領域就是一個公共空間，在這個公共空間裡，福利需求者（如兒童福利聯盟的成員）、社會福利學者……等相關人員可以透過各種媒介或是面對面接觸，來討論一個大家所共同關心的議題 (Ibid.: 220)。Taylor 的概念中將公共領域強調成爲一個公共的空間，而公共空間正是公共論述核心的關鍵所在。然而相關人員可能不同的地點、時間以及利用各種不同的管道來討論兒童福利的議題，那爲什麼還是存在一個共同的論述空間中呢？根據Taylor (Ibid.: 220-221) 的說法，其實他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論述如何有可能性：

「雖然媒體是多樣的，溝通的型態也很不一樣，但是重點是他們都是在相互溝通 (intercommunicating)，今天電視上的討論是在與昨天的報紙對談，而昨天報紙的評論，又是根據昨天的廣播而發的……所有這些論述，就像火車的車廂一樣，一個連接一個，

最後的交集才能形成一個共同的心靈狀態……。」正是在這種一個連接一個，互相參照的狀態，也是這個所謂「兒童福利論述公共空間」之所以能夠形成的基本條件。如果只是純粹的福利需求調查，那麼兒童福利論述公共空間根本無法成立，每一次福利需求的宣稱只是單階、單向性的，並非民間需求與政策的制定、執行者做持續的對話，因此這樣的做法並非真正的兒童福利論述。

因此，交互溝通性或是交互文本性 (intertextuality) 對於兒童福利論述的形態是不可或缺的 (黃金麟，一九九五；李丁讚，一九九七)，即如果沒有真正的對焦對話，不在一個共同的論述空間上發言，就不會產生真正的福利需求論述，在這種情況下，兒童福利措施、政策的真實性很難建立，更別說是要「反覆討論」或是「釐清施行細則」了。

在基進民主的觀念中，兒童福利論述不是可或缺的一個關鍵乃是底層的民衆、社工師

也能主動的參與和表達需求，而不是被動地接受國家機器所制定的兒童福利措施，Dewey (1927: 218-219) 認爲：

「任何理念，在沒有經過溝通、分享，並透過表達將之活化，都只能算是一種獨白，而獨白其實只是一種殘缺不全的想法罷了……任何出版品的功用，都是相當侷限的。透過出版品所組成的公衆，並不是真正擁有知識或是想法的公衆。真正的公衆是在當出版品的意見被這些讀者們口耳相傳討論之後才能形成。」

因此，如果兒童福利的論述只停留在數據、圖表……等符碼上，而沒有真正進入Oweny 所謂的讀者們的口耳相傳討論，那麼有關兒童福利的政策主張，其實都只能算是一種獨白，底層的民衆與社工師面對這種數據、圖表……等符碼時，根本無法與政策有交互溝通性。此外，在基進民主的概念下，認爲兒童福利的細節論述，更是需要當事人或是使用人加入才行，而且兒童福利的論述如果只是停留在少數的菁英論述上面也是不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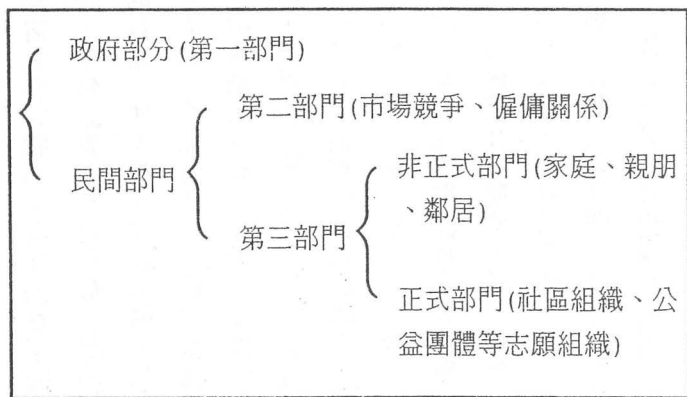
因為菁英論述必然只是一種外部論述，往往會將歐美的福利措施移植到台灣的脈絡中或者總是會圍繞在某些原則或是理念的層次上打轉，儘管有時縱使會進入細部討論，但是這仍不能算是真正的細節，我認為頂多只能算是不那麼抽象的原則而已，如果要將這些細節應用到具體的兒童福利工作上，我想或許要經過社工師或是底層需求者的轉折和應用後才能真正的適用吧！

在基進民主的概念中，所謂一個真正的兒童福利論述，其實是指在面對兒童福利相關的議題時，能夠把所有的當事人分別聚合起來（如討論托育需求時，可以集合台北市教保人員專業協會、保姆協會……等相關團體以及托育的需求者）進行反覆的討論，進而釐清細節和未來具體的方向，如果這些條件都能存在的話，便能反應民間真正的聲音，而論述的結果才能轉化成爲兒童福利具體行動和有效實踐的可能性。由於所強調的論述並非只有菁英論述，更包含當事人的部分，因此在這種的情況下，論述的參與者似乎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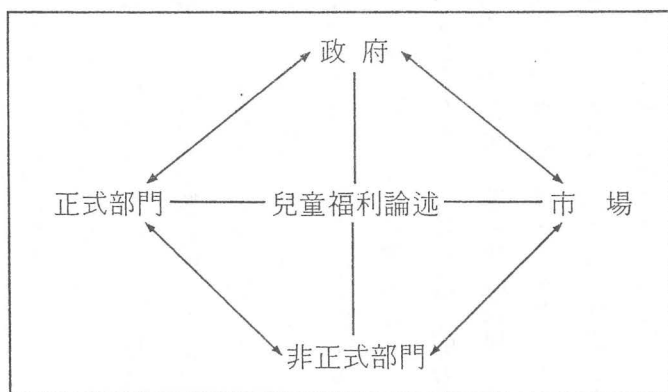
能太多，這樣所有參加的人才能夠真正的參與。至於什麼是兒童福利論述團體的社會性基礎？我想可以藉由Durrkheim中介團體的說法加以思考，雖然在他的說法中介團體主要是以職業團體爲主（Durrkheim, 1908-1900: 20），但是我們應該也可以將他中介團體的概念擴大解釋，以福利多元主義的概念來說，認爲資源與服務的取得是來自於四個不同的部門——政府部門、民間部門（包括商業或市場部門、非正式部門、民間志願部門）（Johnson, 1987: 王順民，一九九五；張英

陣，一九九五；郭靜晃，一九九七），那麼這四個部門（如圖四、圖五）也就是兒童福利論述的中介團體，只有在一個社會中存在著很多這種不同性質、不同種類的中介團體，這樣在論述兒童福利的需求時，才能有多元的觀點，如此兒童福利執行的機動性才變成可能。當然有中介團體的存在，我認為並不代表兒童福利的有效運作因此能動起來，這還要看這些中介團體是不是真正有人有心參與、負責，還是只是一種形式的存在。我

認爲基進民主的概念與福利多元主義中強調參與（participation）說法是相似的，參與的實質意義在於人民可以透過民主程序來表達他們自己的需求，福利消費者與福利提供者共同參與決策（張英陣，一九九五），不過基進民主的概念更強調由下而上公共論述的形成，以至有所改革的行動。



圖四 福利多元主義概念架構圖（王順民，一九九五：九四）



圖五 基進民主下的兒童福利論述
 (修正自黃源協、許智玲的福利菱形圖，
 一九九七：八九)

基進民主與資本主義社會強調的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或是北歐福利國家的社會主義民主 (socialism democracy) 是不同的 (註四)，它不只是表現在自由的制度中，更重要的是它擺脫以福利國家角度切入，反而強調行動民主，一個草根民主，一種透過當事人的參與，在具體的脈絡

意識下，一群人共同面對與行動的過程。我認為在長期以殘補性兒童福利的台灣社會來說，基進民主的概念正是打破傳統以被動福利需求調查化為主動的福利論述參與，扭轉過去中心化的思考，逐漸走向底層，這與福利社區化的概念有相同之處。這也是對於自由民主或是社會主義民主來說，無法達到的地方，因為在兒童福利的新思考上，我們要的已不是簡單的福利需求與福利服務，而是來自更多部門的兒童福利論述與行動上的積極參與，也唯有憑著這種積極性的自由所創造出來的力量，才能擺脫過去殘補式由上而下的兒童福利思考。

五、代結論

基進民主的概念在兒童福利的運用上，所強調的是當事人的行動參與，而非只著重於過去福利服務的制定與執行，為了達到這種目標，兒童福利的論述就應該避免只是做菁英式的外部論述或是語言論述。我認為要全面性兒童福利的變革力量應該來自於行動的層面，就是一種進入民間底層社師、福

利需求者的觀點，與他們互相碰撞的積極行動，換句話說，唯有在最底層創造與參與式的行動，才能真正表達出真實的兒童福利需求與執行全面性的兒童福利服務。在基進民主中所謂的底層，係指社會構成的最基本單位，如民間志願部門、社區發展協會、家庭、甚至是兒童福利的營利機構……等，基進民主的概念運用在兒童福利上面，也是指以上的社會最基礎單位為底層，根據這些單位的特殊脈絡和具體的問題，進行由下而上的參與及論述，並隨時進行反省、批判與產生行動，我想要以民間底層來參與兒童福利的公共論述，必然是種漫長的過程，也可能一點一滴地分別在很小的自主性社群中進行，但是從基進民主的概念中也是可看出台灣社會從殘補式的兒童福利走向全面性兒童福利，甚至是具有預防效果之主導性兒童福利 (proactive child welfare) (郭靜晃，一九九八) 的可能性，以及中心邁向邊陲的福利特殊意義。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社會學組碩士班研究生)

註解：

一、在大部分的福利需求或是福利政策評估的研究中，多數是以量化分析、編定問卷的方式進行抽樣研究，如鄭善明（一九九六）

〈原住民國小六年級兒童福利需求之研究〉以台東縣為例，……等，有的研究是以

多種的研究方法同時進行，如馮燕、郭靜晃（一九九一）在兒童福利法執行成效評估中以深度訪談、問卷、焦點團體……等

研究方法同時進行，但是受訪者仍屬於被動的層面，並非主動積極的參與。

二、由於受到歐美兒童福利思潮的影響，因此

往往將國外的架構移植到國內，如Kadushin（1988）的支持性、補充性、替代性的概念，

但是這是否符合台灣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社會等條件，似乎也沒有進行事先的批判。

三、基進（radical），因其字根root含有根本的意思，因此radical一字在本文中譯作

基進。

四王順民（一九九七）在福利國家的類型學

試析一文中即有比較自由主義類型與社會

民主類型……等福利國家，但是這都是從

國家層面的觀點切入，與基進民主由下而上的概念不同。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王順民 批判理論與福利意識形態（*Healings*

觀點的討論 社區發展季刊六十三期

一九九三 頁七五至八二

王順民 宗教福利與社會福利的再思考

思與言三三（一） 一九九五 頁八五至

一三三

王順民 福利國家類型學試析 社區發展季

刊七十七期 一九九七 頁一四五至一

六一

李丁贊 公共論述、社會學習與基進民主

對食物中毒現象的一些觀察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廿五期 一九九七 頁一至三

二

林萬億 社會工作：從傳統到根本改革 收

錄自基變社會工作 林萬億、古允文譯

著 台北 五南 一九九二 頁二至四

○

林萬億 福利國家：歷史的比較分析 台北

巨流 一九九四

林文凱 民意與社會：民意概念之現代性到

後現代性之變遷 八十六年度社會學研

究生論文研討會 台北 東吳大學社會

研究所 一九九七

林宗弘 從威權／父權體制到基進民主？—

對「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歷史與個案

分析 清華大學社人所文化社會學期末

報告 一九九七

周震歐 兒童福利 台北 巨流 一九九五

張英陣 第三部門與社會政策分析 社區發

展季刊七十期 一九九五 頁一四四至

一五九

陳川正 公共性與社會演化：論哈伯瑪斯公

共領域的結構變遷 東吳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一

- 陳小紅 福利國家改革模式之意涵 經濟全球化的觀點 理論與政策季刊四十三期 一九九七 頁一一三至一三〇
- 彭芸 政治傳播 理論與實務 台北 巨流 一九八六
- 彭淑華 兒童福利政策合法化過程之探討 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 一九九一 查 台北 空中大學 一九九六
- 郭靜晃 海峽兩岸青少年福利工作現況之初探與評析 海峽兩岸社會科學交流研討會論文 台北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 一九九七
- 鄒川雄 社會科學發展的歷史背景 收錄自青少年兒童福利學會 一九九八
- 鄒川雄 社會科學概論 葉啓政等編 台北 空大中學 一九九四
- 鄭善明 原住民國小六年級兒童福利需求之研究 以台東縣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六
- 鄭讚源 既競爭又合作、既依賴又自主 社會福利民營化過程中政府與民間非營利組織之角色與定位 社區發展季刊八十八期 一九九七 頁七九至八七
- 鄭讚源 福利服務民營化趨勢下的志願部門 英國經驗的探討 社區發展季刊八〇期 一九九七 頁八八至一〇二
- 鄭讚源 既競爭又合作、既依賴又自主 社會福利民營化過程中政府與民間非營利組織之角色與定位 社區發展季刊八十八期 一九九七 頁七九至八七
- 馮燕 托育服務之生態觀點的分析 台北 蘇蘅 傳播研究調查法 台北 三民 一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by Iain Hamilton Grant. London: Sage.
- 馮燕、郭靜晃 兒童福利法執行成效之評估 賴世培、丁庭宇、莫季雍、夏學理 民意調查 巨流 一九九五 九八六
-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 (1989),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Baudrillard, Jean (1983),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Trans. By Paul Foss, Paul Paton and John Johnston, NY: Semiotexte.
- Baudrillard, Jean (1985), *The Masses: the implosion of the social in the media*. *New literary history* 16(3), pp.577-589.

Burawoy, Michael (1993), *Ethnography* Macmillan.

O'connor, James (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Y: St. Martins Press.

Unbou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ffe, Claus (1984), *Contradic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by T. Burger, London: Polity Press.

Burghardt, Steve & Fabricant Michael (1987), "Radical social work" in Anne Minahanet al (ed.) *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 18th ed. NASW, pp.455-462.

Crisis"、士難… 社会性危機。 社会… 世變。

RKP.

Dewey, J: (1927),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thens, OH.: Swallow Press.

Taylor, C.. (1992), "Modernity and the rise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Tanner lecture on human values.

Halmos, Paul (1978),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action*, London: Hutchinson.

Durkheim, E..(1898-1900),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 Glencoe, IL: Free Press.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81),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welfare*.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Gil,D.(1990), "Implications of conservative tendencies for practice and education insocialwelfare", *Journalof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XVII: 2, pp.5-28.

transi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pluralism. Sussex: Wistow, Gerald, martin Knapp, Brain hardy Wheatsheaf Books.

Johnson, N..(1987), *The welfare state in Trend, D.. (1996), Radical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Kadushin, M. (1988), *Child welfare service in a mixed econom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Gough, Ian (197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basingtoke: (4th ed.), NY: Macmilliam, pp.29.